

抗战记忆

同舟敌忾济时歌

——抗日战争时期的“同济长征”(一)

“迁来内地以后,将益励员生研究之精神,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,以树立新教育之基础……俾能切实苦读苦干。”

1937年10月25日上午,同济大学开学典礼在浙江金华举行,时任校长翁之龙的讲话掷地有声。

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后,上海沦陷,吴淞同济大学校园被日军炸毁。为了医工救国的初衷、肩负教育兴邦的重任,同济师生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跋涉,别吴淞、过上海、经金华、停赣州和吉安、往八步、歇昆明,最后来到李庄,行程一万多公里,可谓抗日战争时期的“同济长征”。作为抗战过程中搬迁次数最多、行程最远、过程最曲折的大学之一,同济大学在祖国大地上谱写了气势恢弘的“同舟敌忾济时歌”为主题的战时组曲。

1937年,日军侵占平津之后,又在上海制造了“八·一三”事变。从8月13日开始,日军持续对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进行轰炸,特别是8月28、29两日,日本飞机接连投下重磅炸弹,同济大学大礼堂、办公室、工学院、理学院、电机馆、解剖馆、生理馆、材料实验室、实习工厂、图书馆、教授住宅及学生宿舍等建筑,均遭破坏。

幸好“八·一三”事变发生之前,正值放暑假,留校人员很少,鉴于形势日益紧张,学校吸取“一·二八”事变时的教训,在翁之龙校长的部署和秘书长郭德敏、总务长陆振邦的组织安排下,全校凡能拆装的仪器设备和图书等,都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。

8月12日下午,当郭惠申、纪增觉等最后一批人员搬运校产撤离吴淞时,在黄浦江中杀气腾腾的日本军舰已经脱去炮衣准备轰击,大战迫在眉睫。学校从吴淞首次迁到上海公共租界,借用地丰路(今乌鲁木齐路)121号房屋,作为临时校舍。其中测量系的贵重仪器由于细心装箱,专人保管、妥善运输、及时维修,当学校先后迁到金华、赣州、昆明上课时,都能迅速开箱,取出部分仪器使用。学校迁到李庄后,就可全部开箱,供测量系、土木系学生实习使用。

在戈登路(今江宁路)玉佛寺附近一家民房内,医学院师生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,设病床120张。医院由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,郭秉宽教授任医务长,张静吾、黄榕增、章元瑾、李化民、唐哲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,收容了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。

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、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,在沪西大沪花园(现丁香花园)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。学校迁到地丰路后,由于房屋狭小,图书、仪器和设备只能堆着。当时全校学生共1101人,连同在租界内没有回家的教职工100多人,都挤住在这里。学校原计划搭建一部分临时房屋,并准备于10月14日正式上课。但不久,上海战事日益激烈,无法上课,学校决定第二次迁校,从上海迁往浙江金华。

学校从上海迁往金华,一是受到“不久即可停战媾和”论的影响,认为这次抗日战争仍会像“一·二八”那样,地区不会蔓延很远,时间也不会拖得很长,因而不宜迁校过远;二是当时同济校友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席,企图得到他的帮助,且金华离上海较近,搬迁比较方便。当时学校决定,除医学院后期因临床实习,仍留上海宝隆医院上课外,其余院系均于9月迁往金华,并规定师生员工于10月20日前往该地报到。

9月下旬的一天,当本校职工在金华车站看管校产时,遇到敌机前来

侵扰,李先春、周腊生、张凤柱、邢步阶4位校工不幸被炸死。

在金华,学校借到龙游银行房屋作学校总办公室和图书馆,借用金华中学和作新中学校舍上课教室,在章氏宗祠、中山公园等处储藏机械仪器。

在金华报到的学生有596人,其中医学院一、二、三年级88人,工学院222人,理学院11人,附设高职114人,附设高中161人。医学院四、五、六年级学生108人还在上海租界内。在金华授课的教师共33人,其中,中国教师31人,德国教师2人。留在上海医后后期上课的教师共17人,其中中国教师8人,德国教师9人。

10月20日,同济在金华开学。25日正式上课。这天上午,翁之龙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中提出:“迁来内地以后,将益励员生研究之精神,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,以树立新教育之基础,其在海上所沾浮躁奢逸之习气,务须荡涤毋存,俾能切实苦读苦干。”他要求广大师生,适应战时内迁办学的新情况,发扬苦读苦干的精神。

在迁校金华的同时,医学院教师张静吾、黄榕增、章元瑾、郭秉宽等组成南京军医署所辖第五重伤医院,由张静吾任院长,前往苏州救死扶伤。

从11月下旬起,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还编印出版了《合流》报3期。

1937年11月12日,上海沦入敌手,日军紧逼杭州,日机不断空袭金华。在频繁的警报声中,已不能正常上课。于是,学校决定第三次迁校,从金华迁到江西赣州,医学院后期则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。

从金华到赣州,迁校工作困难重重。由于当时车运频繁,火车从金华开出,需费时四五天,才到南昌。再从水路乘木船,溯赣江而上,一路滩多水急,部分师生员工押运校产历时20多天,方到达赣州。

在赣州,1938年1月底正式上课。学校总办公室、图书馆和教室集中在镇台衙门旧址。学生宿舍在武圣庙。教职工宿舍则在城里分散租借住房。

在赣州时期的学生人数,大学部455人(其中医后后期在吉安51人,上海16人),高职167人,中学部100余人。

当时在赣州和吉安共有教师73人,其中本国教授24人,德国教授13人。德籍教师离开上海的家庭来到这里,既无煤气,又缺自来水设施,在生活上不习惯,气候上不适应。没有条件组织学生实习,他们就认真进行口头讲授,耐心帮助学生理解掌握。当他们看到中国学生勤奋求学的精神和尊敬师长的态度,就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。

1938年下半年,德国大使馆在给同济大学的备忘录中指出,因战事关系,德政府原给予德教授的特种补助及旅费补助金,现已不能再继续发给,为应付现时困难,德政府认为最好暂时减少德教授在华的人数。这样,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。只有史图博、柯勒等少数教授表示愿意留在同济继续工作。

大部分德国教授离开赣州经上海回国后,中国教师挑起了教学重担。其中助教陈延年、郑瑞波、张景贤、印均田、李国豪、朱振德、纪增觉、郭惠申等,在母校师资严重缺乏之际,分别为各系学生开出了一批课程,在赣州完成了教学任务。

在校部及工学院迁到赣州时,医学院的师生陆续来到距赣州100多公里的吉安。

当上海沦陷,苏、杭吃紧时,张静吾教授领导的驻苏州的第五重伤医院奉命向江西吉安撤退。李宣

果教授领导的驻杭州的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人员分散向金华撤退,然后迁到吉安。留在上海的医后期的一部分学生,也由学校通知来到吉安。

经过两个月筹备,医学院的院址选在吉安的文天祥祠。1938年春开始复课,以第五重伤医院和医学院办的诊疗所为实习基地。李宣果接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。当时,教授有张静吾、宁誉、章元瑾、李化民、郭秉宽、黄榕增、何鸣九、朱裕璧等。德籍教授有史图博、冯海克、柯勒、安太尔等。医学院附设诊疗所于4月8日开办后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,门诊人数与日俱增,最多的一天达412人,其中以眼科为最多,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眼科门诊合计为1502人次,各科病例合计达2224个。门诊既为当地居民治病服务,又为医科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,为医后期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。

在赣州上课半年,1938年7月,九江危急,局势突变,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,从江西赣州、吉安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。

这次迁校,学生组织了两支步行队。一路从赣州出发,翻越大庾岭,到达韶关后,改乘火车到广州,跨上拖驳小船沿西江到广西都城、梧州,再肩负行装,翻山越岭,徒步几百里,抵达八步镇。另一路从赣州步行到韶关后,搭车到衡阳,改乘还未竣工的湘桂线火车至全县,再步行到桂林,然后乘木船溯漓江而上到平乐,再步行至八步镇。艰苦的行程,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,同学们一路高唱《松花江上》等悲壮的救亡歌曲,沿途散发自己编印的宣传抗日救亡小册子。他们从早到晚,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,忍受饥饿和疲劳,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八步镇。

1938年8月,同济大学话剧团利用迁校去广西的机会,先后在大庾(今大余)、衡阳、长沙、桂林等地,演出《民族万岁》等话剧,既在群众中宣传抗日,又募到了一批捐款,支援抗战。

同济教职工在转运校产的旅途中,为保护校产,也不辞辛劳。第一批校产是由赣州沿章水用木船装运,约半月到大庾,后装汽车运往广东南雄,再装木船由淡水经韶关到三水,然后换船到广西贺江,北上到贺县八步镇。在八步镇,借到一所中学作临时校舍,正在进行维修,准备复课时,10月下旬,日寇进攻华南,在广东大鹏湾登陆,未及一周,广州沦陷,原定校产迁往八步的计划已不能实现。

1938年冬,当第一批校产运到八步江边,还未及卸下时,学校又决定迁往昆明。原船改道沿贺水南下,经西江到南宁,沿左江西上到龙州,经过越南,再运昆明。以后各批校产,即从赣州用木船运到吉安,再装汽车至衡阳,经湘桂铁路到桂林后,用小木船运到平乐,再换大木船经梧州到达龙州,然后运往昆明。

1938年冬,同济第五次迁校,从八步镇迁到云南昆明。这次迁移,分为两路:一路为毕业班同学和患病学生乘汽车经柳州,停留约1个月,再乘汽车到南宁,大部分同学换乘小轮船,小部分同学仍乘汽车到龙州。另一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,编为1个先锋队和6个大队。每个大队分设4至6个小队,每个小队二三十人不等。从八步分批出发,约半个月到达柳州,休息1个月光景,步行至南宁,再改乘小轮船到龙州。所有同学到龙州集中后,由学校派汽车送到凭祥,再从凭祥出镇南关(今友谊关),至越南同登,换乘火车,经潦山、河内,老街至河口,进入国境云南,于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。

(同济大学档案馆)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爸爸的皮袄 ■朱良城

旅游日记

夜幕下的满洲里

■王国荣文

今年暑假,我从上海远道来到了中俄接壤的满洲里。满洲里,这座边陲上的城市,广袤辽阔的土地,在第一眼,就给了我一份惊艳的印象。

天边的云彩在霞光中被印染成绸带般的绯红,晚饭后便驱车上了满洲里市东山植物园的山巅,不为别的,只为了看一眼夜幕中的满洲里市。

山上微风渐凉,夕阳下温润而安宁,给城市带来了一份独特的祥和宁静感,背后的婚礼宫,一如往昔,只是当夜幕快要来临时,显得特别的安静,哥特式的建筑融合了中西风情,不如白天来的那么地壮丽,反而露出了些许的柔情。

天际线在刹那间便淹没在黑暗中,短暂的宁静也随之降临,闭上眼,吹过的风中带着异乡情愫。当城市的华灯渐渐亮起后,这座城市便一改素雅,将其最魅的一面展现。婚礼宫被灯光映出最为娇柔的姿色,和整个满洲里城遥相辉映,而其间暗与影的

留白,则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,这一切应该都与浪漫有关吧。

回到城中,夜还深,在市中心的街区闲逛。两旁的建筑物都以俄式风格,呈现出一种壮观的景致,在柔韵的淡黄色灯光照耀下,熠熠生辉,仿佛只是踏出一步,便到了另一边的俄罗斯。整条道路四个方向都是这样的建筑物铺陈向远方,让宽阔的道路俨然成了广场,有一股肃穆壮实的气息。来来往行的行人,夹杂着俄罗斯美艳的姑娘,混迹着形形色色的游客,加之小商小贩的吆喝,整个街区透露出浓浓的生活气息,才不至于感觉恍如隔世。

这次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旅游,除了欣赏夜幕下的满洲里,我们还看到了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地见牛羊”的壮观景象。延绵起伏的原野,串联起通往天际的道路,把所有城市的繁杂喧嚣都抛到九霄云外了。远处的天空一碧如洗,干净透亮的如同琥珀,从天际铺展至地平线,让人心跟着明亮起来,或许这便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魅力之所在。

闲话花样

茄子和落苏

■郑树林文/剪纸

我们知道在拍照片的时候,用普通话说话时,在照相机上显示出来的是微笑,如果用上海话说落苏的话,照片显示出来的是苦像,上海人听起来有眼哭煞乌拉。

碰到老百搭与小百搭拍照,老百搭喜欢讲落苏,小百搭要他讲茄子,一个说落苏就是茄子,一个说茄子就是落苏,小百搭说拍照片要讲茄子,老百搭还是讲,茄子就是落苏,我晓得。这一老一小争执得谁也说服不了谁,摄影师也没有

了办法,只好让老百搭学着讲几句茄子,趁老百搭学的时候抓拍了几张,一张爷孙俩微笑的照片总算完成了。

